

# “再域”移动社交媒体在移民社会融合中的作用分析

——基于浙江宁波董村的田野调查

**The Role of Mobile Social Media i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an Analysis of the “Reterritorialization” Media**

—A Field Study in Dong Village,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 李彩霞 屠晨皓

Li Caixia Tu Chenhao

**摘要:**移动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对移民社区的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浙江宁波董村移民的个案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合呈现出了过程的非线性、取向的碎片化和基准的多维性三个新特点。而城乡关系的去等级化、社区交往空间中横向传播关系的建立以及移民群体和个人的差异化发展是社会融合呈现新特点的重要原因,这正是社交媒介的“再域”属性的具体表现。移动社交媒体“再域”的过程不仅仅是移民社会空间重构的过程,更是移民社会融合特征变迁的动因。

**关键词:**移动社交媒体;再域;社会融合;社会空间;城市新移民

**Abstract:** Mobile social media as a new way of interac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communitie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immigrants in Dong Village, Ningbo, Zhejiang,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groups presents three new characteristics: nonlinearity of process, fragmentation of orient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benchmarks. The de-hierarchiz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 in the community interaction space, and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integration, which are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e “reterritorialization” property of the new media. The process of “reterritorialization” mobile social media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immigrants' social space, but also the motivation for the change of im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obile social media, reterritorializ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space, urban newcomers

##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先后经过了“乡镇企业——开发区——新城新区——特色小镇”<sup>①</sup>的发展历程,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一些地区通过“撤村并居”建立起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这些新型社区一般以多层单元式楼房为主,农民按照人均30—4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迁入新居,学术界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农民上楼”<sup>②</sup>。在东部沿海城市,由于此类新型社区较为低廉的居住成本,使得“城市新移民”(即“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已在移居城市中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且具有长期定居意愿的群体”<sup>③</sup>)在此类社区中的人口占比不断攀升。同时,据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其中流动人口达3.76亿人,相较于2010年增幅将近70%,<sup>④</sup>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乡城之间大流动大迁移的基本格局将进一步深化。因此,弥合社会排斥因素,推进移民的社会融合,无论从实践抑或学理层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城市新移民与早期的移民相比,具有新的变化:一是移民本身的变化。首先,移民有较长时间的城市旅居史或是在城市中接受过系统教育;其次,移民更多是跨地区的,因此流动性更强,聚居区更加分散;二是移民空间的变化。新形成的移民社区更多是本地居民与移民的“混居”社区,因此社区交往空间的融合成为社会融合过程中关键性的步骤。三是移民社会融合的条件变化。除了外部客观的政府主导、资本注入的因素外,媒介环境的变化更为显著,数字化的交往消解了“空间邻近性”的限制,更丰富了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其中,尤以移动社交媒体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最

① 肖金成,刘保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镇化回顾与展望[J].宏观经济研究,2018(12):18-29,132.

② 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1):66-83,203.

③ 董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J].社会科学研究,2008(1):77-83.

④ 黄玉琦.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怎么看?多位专家来解读[EB/OL].(2021-05-14)[2022-03-22].<http://society.people.com.cn/gb/n1/2021/0514/c1008-32103423.html>.

甚。那么,通过移动社交媒体,移民的社会融合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

##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 (一)媒介空间化研究

在国内外学界,“媒介化”已成为一个跨越多个学科的既定语境。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认为“摩登文化的媒介化取向已经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时空组织方式”<sup>①</sup>。无独有偶,学者克朗和梅在《虚拟地理学:身体、空间与关系》一书中也将“媒介化”列为虚拟地理学四个主要的研究要素之一。<sup>②</sup>在“媒介化”的语境之下,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再到梅洛维茨,新的媒介技术被认为具有改造人们交往方式的能力。学者潘忠党则进一步提出了“中介化”的议题,试图丰富“媒介化”研究的路径,他认为“在‘中介化’的视角之下,不仅人类的传播或交往经由了传媒技术及其相关机制的中介,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通过如此中介了的传播或交往而得以形塑”<sup>③</sup>。通过“中介化”的概念,潘忠党首先将媒介技术的影响从狭隘的“传播”层面引向了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层面;其次,潘忠党指出“‘中介化’的概念包含了比较明确的空间想象……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不再局限于直接感知的物理空间,传媒提供了创造和想象的空间,拓展了生活的空间,同时也提供了流通于社会空间中的建构空间再现和意义的象征资源”,由此他将“媒介化”的过程进一步具象化为一个“媒介空间化”的过程。学者麦奎尔在其研究中指出“地理媒介的核心在于媒介的空间化,这是当前新技术与以往超越空间‘限制’的媒介技术最为关键的区别”<sup>④</sup>,因而进一步将“媒介空间化”与媒介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保罗·亚当斯在《传播与媒介地理学》中则总结了以往的媒介空间化研究,并归纳出了“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与“媒介中的地方”四条基本研究路径。<sup>⑤</sup>学者李彬和关琮严则将“媒介空间化”

① THOMPSON J B.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5.

② CRANG M, CRANG P, MAY J. Virtual geographies: bodies, space and relations[M]. London:Psychology Press, 1999:10.

③ 潘忠党.“玩转我的 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媒体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4):153-162.

④ MCQUIRE S. Geomedia: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M]. Melbourne: John Wiley & Sons, 2017:3.

⑤ 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M].袁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4-10.

定义为“媒介的关系化与结构化过程,也是媒介自身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过程”<sup>①</sup>。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就媒介对社会空间生产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卡斯特指出“流动的网络空间成为一个凌驾于一切其他空间之上的‘媒介空间’”<sup>②</sup>。彭达库认为,电视改变了印度村庄的生活空间和家庭空间,并最终影响了村民的价值系统。<sup>③</sup>西尔弗斯通指出“电视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同时作为媒介与物质自身的性质,这使其与家庭空间产生了‘双重勾连’……通过广泛地中介公域与私域,它使得家庭成员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的意义共享当中,并为建立家庭文化提供质料”<sup>④</sup>。谢静认为社区论坛影响了居民对现实社区空间的认同。<sup>⑤</sup>袁艳认为作为“物”的电视在空间上发展了移民的流动性。<sup>⑥</sup>冯强与马志浩认为移动网络实现了移民家庭空间的再生产。<sup>⑦</sup>何志武与董红兵指出“短视频”下乡重构了乡村公共交往的空间,并导致家庭共享空间的衰落。<sup>⑧</sup>顾博涵认为,后电视时代的电视消费形成了具有第三空间性质的媒介空间,并具有流动、融合与情感化的特征。<sup>⑨</sup>

由上述可见,围绕“媒介空间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在目前乡城之间大迁移大流动的背景下,从媒介空间化的语境出发探讨移动社交媒体对移民社会融合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

## (二)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

“社会融合”一词最早出现在迪尔凯姆关于自杀的研究当中,迪尔凯姆认为“自杀的反常发展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弊病是相同的原因引起的”<sup>⑩</sup>,即“道德的缺乏”,为

① 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34(5):38-42.

② 李耘耕.从列斐伏尔到位置媒介的兴起:一种空间媒介观的理论谱系[J].国际新闻界,2019,41(11):6-23.

③ 彭达库.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一个印度村庄的转型[G]//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方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28-145.

④ SILVERSTONE R.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M].New York:Routledge,2003:83.

⑤ 谢静.虚拟与现实:网络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互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2):107-111.

⑥ 袁艳.电视的物质性与流动的政治:来自两个城中村中的媒介地理学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J].2016,23(6):92-104,128.

⑦ 冯强,马志浩.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9,41(11):24-45.

⑧ 何志武,董红兵.短视频“下乡”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重构: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3):14-23.

⑨ 顾博涵.后电视时代的媒介空间:建构、特性及反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3):76-83.

⑩ 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72.

此,迪尔凯姆寄希望于建立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体系来实现社会融合。

20世纪初,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核心的一批“实证主义”学人受到齐美尔的启发,开始了以移民为对象的社会融合研究。“齐美尔是在论述‘空间与社会的空间定序’的背景下引出‘外来人’话题的”<sup>①</sup>,他指出“陌生人(也译作‘外来人’)并非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今天来并且要停留到明天的那种人”<sup>②</sup>。遵循着齐美尔的思路,帕克在其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中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并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开创性地揭示了“移民报刊”在移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传播的社会功能看起来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和维持理解与文化团结”<sup>③</sup>。帕克的学生安东诺斯基则指出两个独立社会群体间的文化扩散能够抑制“边缘性”的生产。<sup>④</sup> 克里斯蒂安则指出移民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收入水平等经济指标上同本地居民的趋同是社会融合的重要内容。<sup>⑤</sup>

在国内,杰华在其围绕中国农民女工展开的研究中指出了移民的主体性建构方式对于这一群体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性。<sup>⑥</sup> 周晨虹认为缺少“城乡连接性”社会资本是移民难以融入城市的主要原因。<sup>⑦</sup> 汪国华指出向“陌生世界”发展社会网络,正在成为青年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累积经济资本的重要方式。<sup>⑧</sup> 彭灵灵与林蕾则认为,社会组织正在成为影响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sup>⑨</sup>

自芝加哥学派以降,国内外学者已从各个角度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是一方面以往研究中缺少针对中国“城市新移民”群体的考察,另一方面鲜有研究者从齐美尔最初提出“陌生人”概念的“空间”语境入手,探讨“媒介空间化”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试图回答“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特征是什么”;其次,通过借鉴德勒兹的“再域”概念,试图回答“移动社交媒体作用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过程的

① 成伯清.齐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132-133.

② 齐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10.

③ 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M].陈静静,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26.

④ ANTONOVSKY A. Toward a refinement of the marginal man concept[J].Soc.F.,1956(35):35-57.

⑤ DUSTMANN C. The social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6, 9(1): 37-54.

⑥ 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⑦ 周晨虹.城中村居民的“城市融入”:基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类型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14(5):531-537.

⑧ 汪国华.从内卷化到外延化:新生代农民工工地创业社会支持网络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8):56-61.

⑨ 彭灵灵,林蕾.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一项经验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2):43-52.

基础是什么,又是如何作用于移民社会融合过程的”。

## 二、场景选择与样本特征分析

本文的田野“董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董村的人口流动基本只发生在邻近的几个村庄之间,且流动的目的以农事和嫁娶为主。1992 年,沪杭甬高速公路途经董村的“南线路段”开工,为方便工作,约有 8 名建筑工人租住于董村。同年,原村办的“拉丝厂”“毛纺厂”和“纸箱厂”在转为个人承包后,为了快速适应市场,引进了 5 名技术工人,并在董村为他们安排了住房。因此,1992 年董村出现了第一批非宁波户籍的“移民”,2000 年董村经历了“农民上楼”,并就地无土安置,由于租金相对周边较低,加之是宁波本地较早接受移民租住的社区,因此在“上楼”后,董村居民中移民占比不断上升,截至 2022 年 4 月,董村在住房屋共 334 套,人口 1126 人,其中非浙江户口的移民达 577 人。在移民中,贵州籍 183 人,河南籍 113 人,江西籍 94 人,湖北籍 93 人,安徽籍 80 人,湖南籍 14 人。

在移动社交媒体普及前,本地居民间的人际交往主要通过“闲话”来实现,由于这一传播形式的强关系特征,加之吴语区复杂的方言,使得移民往往被隔绝在社区日常的传播活动之外,移民与本地居民形成的是区隔化、等级化的纵向传播关系;2012 年,社区居民自组织了微信群“董家网格群”,而在随后的两年,加入该社群的社区居民已逾八百人(“董家网格群”分为一群和二群,以下统称为“董家网格群”),居委会、物业工作人员也旋即入驻,并在群内实行了实名化,由此该群逐渐发展成为移民与本地居民探讨公共问题的重要场域,移民与本地居民间也通过在该群内的对话形成了平等的、互动的横向传播关系。截至 2022 年 4 月,“董家网格群”内共有社区居民 989 人,其中移民 562 人,本地居民 421 人,6 人不详,居委会、物业、街道办和村委均有工作人员入驻。

本研究采用线上与线下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文中引用的材料均来源于笔者 2021 年 6 月至 8 月、2022 年 1 月至 4 月在董村进行的实地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以及自 2020 年 8 月开始的线上参与观察。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研究采用以户籍归类的分层抽样方法,共计访谈移民 18 人,此 18 人均有稳定工作,且有明确的留甬意愿,具体信息见表 1。此外,分别于 2021 年 1 月与 2022 年 4 月对居委会主任进行了两次访谈。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户籍	户籍类型	从事行业	主要使用的移动社交媒体	在甬工作时间(年)	在董村居住时间(年)
1	女	贵州	非农	餐饮管理	手机 QQ、微信	15	15
2	女	贵州	农业	餐饮管理	手机 QQ、微信、钉钉	15	12
3	男	贵州	农业	餐饮服务	微信、小红书、快手	6	6
4	男	贵州	农业	餐饮服务	微信、微博、INS	6	6
5	男	贵州	非农	银行职员	微信、手机 QQ	5	5
6	男	贵州	农业	外卖骑手	微信、钉钉、抖音	8	4
7	男	河南	农业	室内装修	微信、微博、手机 QQ	8	6
8	女	河南	非农	保险销售	微信、微博、小红书	9	3
9	男	河南	农业	社区保洁	微信、手机 QQ	11	11
10	男	河南	农业	社区安保	微信、抖音	8	8
11	男	江西	非农	工程造价	微信、手机 QQ	25	19
12	男	江西	非农	蔬果批发	微信	11	11
13	女	湖北	非农	IT	微信、手机 QQ、Line	5	5
14	女	湖北	非农	酒水销售	微信、手机 QQ	9	6
15	男	安徽	农业	房产销售	微信、手机 QQ、小红书	10	10
16	男	安徽	非农	服装外贸	微信、手机 QQ、小红书、微博	4	4
17	男	湖南	农业	汽配销售	微信、手机 QQ	7	7
18	女	湖南	农业	物流运输	微信、手机 QQ	12	12

### 三、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特点

#### (一) 融合过程的非线性

在董村的移民中,社会融合的过程表现出了非线性的特点。帕克认为“竞争、冲突、适应和同化”是社会重组的基本过程。“适应”是指移民群体为适应城市生活而被迫边缘化的现象,“同化”则是指移民与本地居民间的区隔消失,价值观念相互混合的现象。而这个过程总是遵循一个“冲突—融入”的线性过程,“如果没有敌视和冲突,移民就不可能团结一致地进入美国社会生活”。

但在董村的移民中,由于移动社交媒体嵌入了移民的日常生活,导致社会融合的过程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有的移民并没有经历“冲突”阶段,而是借助在移动社交媒

体中构筑的社会网络融入本地社会生活,有的则只是将移动社交媒体作为工具或娱乐手段,导致了“适应”但不“同化”的现象。

访谈者 18 来自湖南,已在宁波生活 12 年,据她回忆十多年来自己并没有同本地人有过冲突,她说:

“我们当时来宁波就是看到宁波发展比较好,但压力又没有上海北京这些地方大,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宁波的政策,宁波毕竟是‘文明城市’嘛。然后,当时有几个朋友已经在宁波发展了,主要就是做快递的,平时和他们聊天还有看他们发的一些朋友圈,就觉得挺向往这个城市的。后来来了之后本地人也没有说很排斥,现在我们宁波话也能听得懂了。”

但是,在城市新移民中出现了“适应”但不“同化”的现象,即移民在被恒久地边缘化的同时,缺少了同本地居民建立对话关系的社会环境。例如,访谈者 6 在董村租住了四年,原在家乡务农,后因家人染疾来甬做工,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有八年。

“我们农村过来的,又没关系,也没什么技术,就只能做做这个呗。他们有关系、有技术的几个月就当上站长了。”

在谈及自己同本地居民的关系时,访谈者 6 直言:“我们每天都很忙,手机主要就是导航、接单和打电话这些,抖音会刷,但是很少,偶尔打打游戏,就是和站里的人一起打。认识的本地人很少,因为自己主要就是在站里,站里没有本地人。”

## (二)融合取向的协商化

移民社会融合的第二特征融合取向的协商化,移民并不是消极地剥离旧有文化,而是积极地与本地文化协商。美国学者在移民社会融合研究中提出了“熔炉论”,认为融合具有本地化倾向,即“以白人新教徒为主的美国人单向度地按照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对外来移民实行同化”<sup>①</sup>,而移民为融入当地社会将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特征。

在董村,移民与本地居民在文化上的冲突更多地表征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例如,2013 年移民组织的广场舞曾被本地居民投诉为扰民,并一度遭到禁止,而据访谈者 11 回忆,甚至有两户租户因此被物业勒令退租。在此事件中,融合的取向表现出本地化的特征,而移民为了融入本地社区不得不单方面做出妥协。

融合取向由本地化向协商化的转变,同社区交往空间的变化有关。在广场舞被禁后不久,移民曾找到物业表达继续组织广场舞的诉求,但遭到拒绝。于是移民转而向

<sup>①</sup> 隋笑宇,梁茂信.理想与现实的悖论:美国“熔炉论”神话的破灭——以匈牙利移民为中心[J].求是学刊,2011,38(6):126-132.



社区居委会反映情况,居委会主任回忆说“当时我们居委会讨论了好几次,拿不定主意,后来就想着能不能向大家征求些意见,看看怎么办”。此后,在“董家网格群”内多次就广场舞的问题展开过交流,居委会也陆续组织了几个广场舞的领舞到群内参与讨论,本地居民在考虑到当时社区公共健身器材不足的情况下最终与移民协定了诸如广场舞必须在晚上九点前结束,高考前夕禁止外放伴奏等规则。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广场舞扰民,另一方面也满足了移民的诉求。如今,广场舞不仅在移民群体中颇受欢迎,许多董村村民也乐于参与其中,甚至在访谈者 11 领舞的舞群中本地人的占比已超过七成,而舞群的组织也越来越有赖于虚拟社群来开展。访谈者 11 说“现在我们还建了个微信群,每天晚上规定好出操时间,不能来的要在群里请假”。

由此可见,移民通过积极行动消解了交往空间中的区隔,并利用社交媒介建立了同本地居民的对话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单向度的、本地化的融合取向转而向双向的、协商化的取向发展。

### (三)融合基准的多维化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过程中,社会融合基准正在逐渐向多维化发展。在同移民的交流中笔者发现,移民更多地从自己的认知和经验出发而非诸如户籍、职业、收入等客观标准来定义自己“社区人的身份”。

他们更多地将定义自己“社区人身份”与住房条件、建立婚姻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关联起来。

“我觉得我要在宁波买房了,那我就是宁波人了,但是现在太贵了,我只能租房子住。”(访谈者 10)

“我觉得要是能娶个本地的老婆,可能在宁波工作生活会更好一点,更稳定一点,不然也说不定以后在不在宁波。”(访谈者 15)

“在宁波朋友很多嘛,就在这里生活得比较好一点,去其他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也不方便。”(访谈者 11)

社交媒体连接不同群体的能力,是移民社会融合基准多维化的重要原因。移民对于融入基准的主观定义是其主体性回归的表征,但是“一个人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sup>①</sup>,群体能够对移民个体关于基准的主观判断产生影响,而社交媒体通过将个体置于不同群体交织而成的虚拟网络中进一步消解了“统一性”

<sup>①</sup> 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32-38.

标准的意义,继而以群体的价值认同替代了融入的客观标准,推动了社会融合基准的多维化、动态化。

“我明年就三十岁了,很多朋友啊,还有老家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小孩子都上学了,那你说我急不急?我还是做房屋买卖的,客人里小夫妻不要太多哦,一打开朋友圈全是人家买房结婚的东西,你说烦不烦?”(访谈者 15)

#### 四、再域:移动社交媒体作用社会融合的基础与表现

社会融合的对立面是社会极化,其“表现为城市社会空间碎片化,城市‘双城化’和弱势群体社会空间的隔离与边缘化”<sup>①</sup>。因此,建构一个去区隔的、正义的社会空间是移民社会融合的现实需要,而移动社交媒体正是通过“再域”(reterritorialization)这一过程实现了这一空间的形成。

“再域”这一概念来自德勒兹,在德勒兹的作品当中“再域”与“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经常作为一组对称的概念出现,他并未对两个概念做过具体的界定,但以隐喻的方式对它们做过解释,“作为被解域化的掌,可移动的手在穿过树林时所利用的枝杈上被再域化;作为被解域化的移动,抓东西的手在它要挥动或抛掷的被摆脱的、被借用的、被称作工具的诸要素上被再域化”<sup>②</sup>。由德勒兹的隐喻可知,他所指的“再域”是指人类在行动中,通过工具使用实现的自我与环境的调适、融合。詹姆斯·罗尔在《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一书中指出“结域化是一个对熟悉事物和新生事物的积极文化选择与综合的过程”<sup>③</sup>,詹姆斯·罗尔将“再域”的概念置于后现代的语境当中,认为“再域”是人们在后现代支离破碎的文化语境中积极建构自己文化世界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如果对“reterritorialization”做一词源的追述,便会发现该词的词根“terra”源自大地女神在罗马神话中的名字,而在拉丁文中其意为“陆地、领土”,因此,“再域”从词源来看应具有一层“重构空间”的意义。

因此,“再域”是指移民通过使用移动社交媒体脱离既定的等级化社会空间,并以重构、流动和连接的方式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过程。这是移动社交媒体对移民社会融合作用的一种概括,也是移动社交媒体作用于移民社会空间重构的一种方式。

① 韩勇,贺萌琳,高军波,等.空间隔离视角下中西方城市社会排斥研究述评[J].人文地理,2020,35(6):26-34.

② 德勒兹,帕尔奈.对话[M].董树宝,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197.

③ 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M].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98.

## （一）再域”的基础：解域与伴侣化

### 1. 解域

“解域”可以被理解为脱离既存结构性约束和等级化分类的运动，它的功能性特点包括“解放、搬迁、逃逸、崩断、转变和创造”<sup>①</sup>。对城市新移民而言，他们的“解域”在两个层面上发生。

首先是身体在物质空间上的“解域”。“移民”身份从一开始就是由身体在物质空间的“解域”实现的。同以往给人的刻板印象不同，“城市新移民”并不是一个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群体，反倒是由于空间的解域使得他们身上带有了异乡人的“流动性”，这种流动的社会位置感使得他们常常有着客观的态度和积极的生活观念，能够“不受群体的特定渊源和偏袒倾向的束缚”。

例如访谈者 10 左眼失明，经残联介绍后在社区负责保洁工作，尽管目前生活拮据，但他在交谈中透露“我计划是明年下半年就不自己做了，和一个老乡合作，打算干个承包队。我和这边小区的领导都很熟的，以后就承包这几个小区的保洁。谁还不能当老板了”。

其次是经由媒介在社会空间层面的“解域”。梅罗维茨认为，“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场景定义的讨论可以由直接物质现实问题完全转向只关注信息渠道”<sup>②</sup>。经由移动社交媒体中介的移民社会空间，得以“超越地域”，发展起在物理空间上跨度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没有这张网络，身体在物质空间的“流动”便会失去方向性和安全感。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中，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人际关系是以“我”为中心、以亲缘为媒、以权势为界似水波纹般向外扩散出去的，其中的“我”、亲缘和权势无一不与乡土的静态空间相绑定，而这个向外扩散的“圈”也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空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如若一个“差序格局”中的农人突然被抛进城市，他大抵会如“骆驼祥子”那般迅速地无产化，这不单单是由于经济的困顿，更是因为他的“圈”，他的社会空间，无法在城市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城市新移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如果渴望迅速地适应城市的社会生活，就必须实现社会空间从物质空间中“解域”，而这有赖于移动社交媒体技术特性的发挥。访谈者 3 和访谈者 4 是两兄弟，原在杭州做农家乐，但因资金问题失败，于是访谈者 3 就通过朋友圈发布了一

① 张能. 创造与生产：论德勒兹思想中的解辖域化思维[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4(2): 23-29.

② 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 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33.

条“求职”信息,“能开车能做菜,哪位老板赏口饭?”而这条朋友圈被他的一位“网友”看到后立刻联系了他,访谈者<sup>3</sup>和访谈者<sup>4</sup>因此在宁波实现了“再就业”。

## 2. 伴侣化

“伴侣化”指人们通过主动消费移动社交媒体,使其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并同人们在时空中共生、相伴的过程。访谈者<sup>12</sup>曾言“现在手机比老婆还亲,一刻都离不开”,笔者借用他的比喻提出了“伴侣化”一词,并认为通过“伴侣化”移民“驯化”了移动社交媒体,为己所用。

在消费移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移民主要通过“选择”“携带”和“操纵”三个步骤实现移动社交媒体的“伴侣化”。首先,“选择”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第一,通过理解移动社交媒体的载体作为“物”的“符号性”,移民对诸如手机的价位、类型、品牌、型号和版本等进行选择。第二,基于对移动社交媒体的功能判断,移民对具体的社交软件进行选择,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选择”,移民表明了自身的社会位置并建立起社会阶层的归属感,譬如在同访谈者<sup>9</sup>交谈时间问及为什么他喜欢用“三星”,他说:“国外的牌子总要高档点嘛!”而访谈者<sup>3</sup>认为“看快手就是看看段子,里面的梗蛮有意思的,像我弟弟不看,所以有时候我们几个玩快手的开玩笑他听不懂的”;其次,在“携带”阶段,移民一方面通过随身携带诸如手机、Apple Watch等移动社交媒体的载体形成人与技术的陪伴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移动社交媒体的复合性,银行、餐厅、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似乎也变得仅一“键”之隔;最后,在“操纵”阶段,相较于传统大众媒介,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更能够操纵媒介使用的场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掏出手机通过移动社交媒体进入虚拟空间中,无论当下身处在何种物理空间中,这打破了传统媒介技术消费与身体情景之间静态的对应关系(看电视时往往在家中,看电影则需要去电影院)。通过以上三步,移动社交媒体逐渐成为移民们亲密无间的“伴侣”,而移民也通过“选择”“携带”和“操纵”将移动社交媒体的载体及其内涵的象征再现“驯化”为实现自我意识、表达社会身份和编制社会网络的器具,并在此基础上应允移动社交媒体进入自己的“生活世界”之中。

### (二) 再域化”的表现:网络、空间与互惠圈

现实空间中建构的区隔在技术的中介下被逐渐模糊和冲淡,而这为形成一个平等的、公共的、正义的社会空间提供了条件。社会交往的正常化和多元化不仅使得移民群体拥有了自我言说的机会而不至于沦为沉默的“他者”,并且为移民构建适应城市生

活的“小世界”提供了路径。因此,移动社交媒体“再域”的意义并不在传播之外,而是传播本身,建构一个更具“沟通性”的社会空间既是移动社交媒体“再域”作用的表现,也是移动社交媒体作用于移民社会融合过程的方式。移动社交媒体在移民与移民、移民与本地居民、移民与家乡亲属之间建立了更具“沟通性”的社会空间。

### 1.移民间的社会网络:从“共性”到“流动”

由技术和身份共性筑起的社会网络推动移民适应城市生活,并避免与本地人产生冲突。董村移民的“共性”主要有两点,首先,移民对于自己目前“外来者”的身份都具有较高的认知上的统一性。访谈者 11 在宁波生活了二十余年,“我们哪里算宁波人哦,我们只是打工的,以后孩子嘛在宁波长大的话可以说是宁波人”;其次,移民能够利用移动社交媒体主动与其他移民产生连接。基于这两点共性,移民间的社会网络变得更具流动性,也推动了移民的适应与同化。

移民借助移动社交媒体形成了规模不一、功能多样的社会组织来协调本地人与移民间的交往。访谈者 1 在宁波经营餐饮已近十五年,是“宁波贵州商会”较早的一批成员,她说:“最开始就是我们几个从贵州过来做生意的有个微信群,方便大家说说话,有时候也互相介绍点生意,后来大概就有一两年人越来越多嘛,就大家说要组织起来,后来政府也过来帮我们,有商会还是好,不然做生意被欺负了没人管你。”

移民间的社会网络通过连接同质人群为初到城市的移民提供了社会关系支持,也让更多的移民得到了实惠,比如访谈者 14 的销售工作就来自老乡的介绍。

### 2.移民与原住民的交往空间:从“纵向”到“横向”

“建立一个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强大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区,这就是社会融合”<sup>①</sup>,社区的融合是社会融合的微观表现(如表 2 所示),移动社交媒体对社区交往空间的建构是社区融合的重要条件。在移动社交媒体普及前,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交往空间中充斥着纵向的传播关系,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地居民之间继承于自然村阶段的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有赖于同移民的区隔化、等级化来实现再生产;其次,本地居民间有赖于“方言”和“亲缘”组织起来的“闲话”传播活动,既是一个分享生活世界的信息传播渠道,同时也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机制。因此,本地居民可以使用内部的话语体系将“移民”置于“他者”的地位加以评述,移民则被拒于这一传播体系之外,无法参与到“社区应该如何”的对话当中。

<sup>①</sup> 嘎日达,黄匡时.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J].国外社会科学,2009(2):20-25.

在移动社交媒体的中介下,社区交往空间中出现了更多的横向传播关系,其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借助虚拟社群实现了移民与本地居民间的对话;其次,移民与本地居民能够通过对话形成共同的行动。

“董家网格群”是由董村居民自组织的微信群,起初网格群只是作为居民们分享信息的场所被组织起来,但随着社群参与者数量的增加、社群内部的实名化以及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入驻使得社群逐渐具有了一些“公共领域”的特征。在社群中,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移民都能够随时参与到社区日常管理活动中。此外,诸如移民子女的入学问题、为移民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问题等这些颇具公共性的问题都曾在社群中热烈地讨论过,而移民与本地居民借助社群展开的交往正逐渐在他们之间建立起平等的、群际的对话关系。

访谈者 2 是较早加入网格群的移民,据她回忆,2018 年 5 月网格群曾联名向街道提交了修缮社区中央凉亭的建议,并组织了线下“智囊团”对修缮凉亭的成本进行估算,甚至宁波电视台一套的《看看看》栏目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如今,经修缮后的社区中央凉亭已成为社区居民社会互动的重要空间。

表 2 传统媒介与移动社交媒介在社区融合中的作用

	传统媒介	移动社交媒介
人际传播中的双方	移民与本地居民	
社区交往空间的结构	纵向传播关系	横向传播关系
代表性媒介	以“闲话”为代表的面对面人际媒介	以“虚拟社群”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
潜在逻辑	区隔化、等级化	互动化、平等化
融合取向	本地化	协商化

### 3. 移民与流出地亲朋的“互惠圈”:从信息互动到礼物流动

借助移动社交媒体,移民与流出地亲朋之间不仅信息互动更加紧密,而且重新建立了礼物流动的渠道。首先,移民同流出地亲朋间的信息互动更加紧密与便利。2022 年 4 月,受访者少则与流出地亲朋网络电话三次,多则十次(见表 3),访谈者 15 表示“网络电话方便嘛,我到—个地方就要换个当地的号码,电话要存号码很麻烦,网络电话还省钱”。

除此之外,网络电话具身的呈现方式还提高了信息流动的质量,忽略了物理空间距离,在与家乡亲属“相见”的过程中,人们能够通过互相观看获得更多的亲近感,有助

于维持连接的亲密性。

表3 2022年4月受访者与亲朋互动情况

编号	通话次数	与亲朋通话内容	编号	通话次数	与亲朋通话内容
1	8	清明祭祖、婚嫁、经济往来	10	4	父母近况、婚嫁
2	4	清明祭祖、经济往来	11	3	子女近况、经济往来
3	6	婚嫁、子女教育	12	9	亲属近况、经济往来
4	6	经济往来、父母近况	13	8	清明祭祖、父母近况
5	3	亲属近况、清明祭祖	14	4	亲属近况、身份证补办
6	3	经济往来、父母近况	15	6	工作介绍、旅游计划
7	4	工作介绍、子女教育	16	3	经济往来、父母近况
8	10	保险推销、经济往来	17	3	清明祭祖、经济往来
9	4	亲属近况、子女教育	18	5	经济往来、白事

其次,移民在“礼物的流动”中重新参与家乡的“互惠圈”。“互惠圈”是指人们基于地缘、亲缘形成的并通过礼物的流动来体现相互责任与义务的社会网络。在移民离开移出地后,信息的互动维持了家庭成员间的社会交往,而同家乡更大社会网络的联系通过“礼物的流动”来实现。“互惠圈”中的“礼物”在移动社交媒体的中介下存在两个“流动”的维度。第一是物质礼物的流动,访谈者12在元宵节网购了宁波汤圆寄给家乡亲朋,清明则寄送了青团,平日里还给亲朋的子女网购过书包、文具和衣服等,他直言“礼物多少都是心意,有这些往来说明还是亲戚嘛”;第二,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和打赏等方式实现虚拟礼物的流动,访谈者18曾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亲人的“水滴筹”消息并附言:“旧疾未愈又再次查出癌症,请大家帮助和转发!这是我的亲人,谢谢你们了!”而后不到两天他的亲人便凑够了手术费用,访谈者10则在工作之余常常打开朋友圈给家乡亲朋点赞、评论,用他的话说“点一点赞嘛,人家看到很开心的,没事情再评论一下,开开玩笑,就好朋友之间嘛,很正常的事情”。由此可见,在移动社交媒介的中介下,原本因背井离乡而与亲眷疏远的移民,得以重新参与到家乡“互惠圈”的礼物流动中,这帮助移民避免了融合过程中的焦虑,满足了移民的情感需求。

## 五、结语

对于移民而言,移动社交媒体的交互性、虚拟性和实时性在主体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产生了“解放性”,而就由此形成的组织、连接与流动催生了不同群体间颇具“沟通性”

的社会空间,这既是“再域”过程的具体表现,也是移民“社会融合”呈现出过程的非线性、取向的协商化和基准的多维化的原因。

人们使用媒介的基本目的在于跨越物理空间的障碍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媒介技术之所以能够在智能化、数字化的浪潮中兑现人们的初衷,源于移动社交媒体的可供性与技术使用者的主体性。在董村的个案中,移民通过“驯化”移动社交媒体,建构起了一个跨越物理距离、消解等级区隔和弥合个体分化的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的内涵是超越地域的、正义的、对话的传播关系,移动社交媒体的“再域”最终对移民的社会融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诚如芬伯格所言,“技术设计不是中立的,而是通过支持统治利益的授权具有规范上的倾向”<sup>①</sup>,在当下商品化、垄断化的技术市场中,媒介技术及其责任组织由于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正在资本的裹挟下逐渐走向“解放”的对立面,而为了博取流量刻意制造地域对立,通过算法加深不同群体间的区隔等现象在如今的网络世界中并不鲜见。如果任由这一趋势恶化,移民借助移动社交媒体实现的“再域”过程,将不得不走向其初衷的对立面,而社会融合也将举步维艰。

〔李彩霞,山西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屠晨皓,山西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顾洁〕

---

<sup>①</sup> 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3.